

感 念

2026年初夏，我又一次站在广西全州湘江岸边。

距离我第一次走进这片红土地，已经过去22年。江流平缓，两岸青山如黛。9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，这条江曾经被血水染红。湘江战役后，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.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。

20多年来，我采访过很多老红军、老八路、老新四军战士。在许多个午后或黄昏，我握着他们枯瘦的手，听他们讲起那些比生命还重的人。

那些讲述里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词：战友。

—

在江西于都，我采访过一位老红军的后代。他父亲生前几十年一直在找一个人——找那个在渡口把自己从水里捞起来的“大个子湖南佬，络腮胡子”。1934年10月，敌机炸毁浮桥。他父亲落进冰冷的江水中。有人一把抓住他父亲的后脖颈，把人拎上了岸。两个人连名字都没来得及问，就冲向了不同的方向。

此后半个多世纪里，他父亲多方打听，也没有得到半分音信。临终前，父亲嘱咐儿子接着找，“人家救了我的命，我不能连谢谢都没说就走了。”

我跟着这位红军后代跑过几个地方，可一无所获。后来，他说了一句让我记到今天的话：“找不找得到都认了。我爸惦记的不仅是那个恩人，更是那种一辈子都还不清的情分。”

那种情分，我在其他老红军的讲述中，也多次体会过。

谭发贵随队伍长征时，不到12岁。翻越夹金山时，他的草鞋磨穿了。班长把自己仅有的一床破旧被单撕开，裹住他的双脚。“你年纪小，冻坏了就走不出雪山了。”谭发贵不依，要把被单还给班长。班长却说：“我是大人，火气旺！”

在往后的征程中，谭发贵紧紧跟着班长那双沾满烂泥的脚板。他个头小，腿短。班长慢走他就快走，班长稍快他就得跑。他就这样跟着那双脚，翻过了雪山，走过了草地，最终到达陕北。

后来，谭发贵问班长为什么对他这样好。班长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小鬼，在家靠父母，在革命部队靠党、靠同志。咱们是阶级弟兄啊！”

二

采访老红军向守志，第一次是在2000年，他83岁；最后一次是2015年，他98岁。每一次讲长征的故事，他都很动情。

2000年那次，我坐在他家简朴的客

战 友

■梅世雄

厅里。长征时，向守志是连队收容队负责人之一，拄着一根竹棍走在队伍最后面。他说：“收容队成员不仅自己要与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，还肩负着帮助体弱和有病人员的重任。”

党岭山上，风雪交加。向守志拄着竹棍走着，沿途有同志的腿被冰雪划破，滴着血；有同志的草鞋陷在雪里，光着脚；路旁不时出现拱起的“雪堆”，里面是冻僵的战友。突然，一名战士从山上滚下，眼看要坠下悬崖，好在一块巨石挡住了。向守志拼力冲上前，把竹棍撑了下去。那名战士艰难地摇头：“不行……我会把你带下来的。”向守志吼道：“快抓住！”战士刚握住竹棍用力，向守志就被带着往下滑，好在连长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。在三四位收容队员的共同努力下，那名战士得救了。那名战士被救起后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巨石落下了悬崖。

我问他：“您在雪山中总共救了多少战友？”

他摆摆手说：“到底有多少，我也记不清了。至少有十几位吧！”

2006年，我再次去采访他。89岁的老人说起过草地时的救人技巧，眼睛里还闪着光：“草地救人不能像雪山那样使猛力，要站得远一点，轻轻地把竹棍伸出去，使用巧力。否则不但救不了战友，还可能把自己也拉下去。”

2015年，我最后一次去看他。98岁的他在卧床休养。一提起长征，老人挣扎着坐起来，握着我的手，眼中噙满泪水说：“战友情谊，比天高比海深！”他还说：“每个人都争着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，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。”

三

草地上的故事，讲起来往往更沉重。1936年7月，红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274团8连第三次过草地。周广才所在班14人只剩7人，断粮后靠野菜、草根、树皮充饥。等枪皮带、鞋底皮掌也被吃完后，只剩他腰间那条1934年在任合场战斗中缴获的牛皮皮带。

周广才主动拿出腰带与大家分食。看着皮带被切成一段段皮带丝，漂在稀溜溜的汤水里，周广才攥紧剩下的半截皮带，眼含热泪激动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把它留下作个纪念吧，带着它到陕北，去找党中央，去见毛主席。”大家同意了。后来，班里的6位战友相继牺牲。班长临终前叮嘱他：“一定要走出草地，带着它去找党中央、见毛主席。”后来，周广才走到延安，用烧红的铁钎子在皮带背面烫上“长征记”3个字，珍藏了几十年。

我采访过周广才所在的老部队——第75集团军某红军旅。在旅史馆，我看到了那半截皮带的照片。连队指导员告诉我，周广才的儿子周国平曾对官兵说：“我父亲常说，他能走出草地，多亏了战友谷汗成。长征路上，粮食奇缺、天寒地冻，

谷汗成将自己的干粮留给年少的周广才，夜里还把仅有的半条被单盖在他身上。”周国平还告诉他们，周广才所在连队出发时120人，胜利抵达陕北时只剩25人。

站在旅史馆展板前，看着那张半截皮带的照片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14岁的少年，在草地上接过一碗汤、半条被单、半截皮带的画面，也看到了班长临终前叮嘱他时，那双仍闪着光的眼睛。

四

老红军苏力的故事，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2006年，我在上海见到了苏力。她坐在椅子上，身材瘦小，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。她告诉我，那是被地主婆用刀砍的。苏力1岁时，父亲去世，母亲把她卖给地主当丫头。1935年春，红四方面军来到她的家乡四川青川县。她连续去了红军被服厂4次，都因为年纪太小被拒绝了。第5次，一位红军大姐姐问她：“小妹妹，你会干什么？”苏力见大姐姐正在缝制红军服，灵机一动说：“我会钉扣子。”她当场钉好了几颗扣子。就这样，被服厂多了一位年仅8岁的“红军娃”。

我问她：“您那么小，不怕吗？”她笑着说：“怕什么？红军是好人，是为穷人服务的。”

长征路上，苏力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。年长的红军帮她背粮食袋子，红军大姐姐匀出粮食给她吃。最让她刻骨铭心的，是一次敌机轰炸。

那天，一颗炸弹在苏力身边爆炸，她昏死了过去。醒来后，她发现身上压着一位大姐姐。那位大姐姐已经牺牲了，她用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苏力。

我问她：“您还记得那位大姐姐叫什么吗？”

她摇摇头，沉默了很久。“我不记得轰炸是在什么地方，也不晓得救我的大姐姐叫什么名字。”

后来过草地时，苏力差点掉队，是一个大哥哥背着她赶上了队伍。苏力在晚年回忆说：“长征是我革命生涯的起点，长征精神激励和影响了我的一生。”

五

老红军汪运祖，我采访过3次。第一次是2006年，他91岁；第二次是2007年，他92岁；第三次是2014年，他99岁。

第一次见面，他的精神很好。我问他当年是怎么参加红军的。他说：“1927年黄麻起义时，我12岁，是儿童团团长，带着几十个小伙伴跟在农民起义军后头喊口号。我那时想当红军，可因为年纪太小被拒绝。”顿了顿，他又说：“1931年，我16岁，硬闯进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先念的办公室，对他说：‘我跟你定了，一定要参加红军！’”



军号·马灯

■张德平

军 号

一把铜铸的军号
风骨胜得过枪炮轰鸣
纵是深谷锁雾，烽烟蔽野
嘹亮号音照样穿透重重防线

将濒死的困境吹奏成重生的希望
把心底的怯懦淬炼成赴死的刚强
激越的长鸣，撕破层层包围

冲锋、撤退、宿营、驰援
铜质的军号攥紧战士的神经
这支风餐露宿的队伍
被号声牵引着前行

爬过皑皑雪山，涉过茫茫草地
二万五千里征途
声声军号，吹开一条血染的生路

敬所有长眠地下的司号员
敬展馆里静静伫立的旧军号
时光磨不去峥嵘过往
铜号悠远绵长的余韵
至今犹在天地间回荡
江河闻声便心潮澎湃

长征途中，汪运祖在红四军第10师给副师长王近山当书记。1935年11月，红四军攻占蒙经县，遭国民党部队反扑。汪运祖在夺取城外一个高地时被机枪击中胸部。“是开花子弹，在身体内炸了一个洞，断了三根肋骨。”

两个通信员扑上来救他，结果一个受重伤，一个牺牲了。转移途中，还牺牲了一个抬他的通信员。汪运祖伤得很重，5年后伤口才愈合。

有一次，瘦小的通信员实在抬不动他了，在路边哭。当时他们已经掉队，王近山找到他们后，马上找来十几个战士轮流抬他。事后汪运祖才知道，当时敌人追得非常紧，如果再晚一点，他们就有可能当俘虏。

汪运祖与王近山是生死之交。1935年10月，汪运祖曾带人将陷入绝境的王近山救出。一个月后，汪运祖负了重伤，王近山命令第28团团长：“什么都可以丢，就是要把汪运祖给我抬出来。”

第三次采访时，老人已经卧床。工作人员对我说：“老人一辈子念叨，没有王近山，就没有他。”汪运祖听到这句话，挣扎着要坐起来，“不是王近山，是战友。是战友就不能丢下。”

六

2026年，我再次来到延安。宝塔山下，我想起20多年来采访过的那些老人。现在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每一次送别，我都觉得像是送走了一位亲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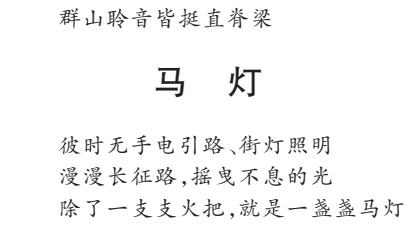
延安革命纪念馆展柜里，有一条枣红色的羊毛毯。它长194厘米、宽131厘米，上面有多处缝补痕迹。它原是宁都起义领导人董振堂的。1931年，董振堂把它送给朱德，这条毛毯从此跟着朱德走完长征路。1936年西安事变后，朱德把它转赠给赴西安谈判的周恩来。抗战全面爆发，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前线，周恩来又把这这条毛毯回赠给他。这条毛毯，朱德一直用到全国解放。

站在展柜前，我想：对一名军人来讲，战友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我想起在阿里高原采访的那个冬天。在海拔近6000米的哨所，一名战士巡逻时突遇险情，身边的战友几乎同时扑上去救他。事后我问那个战士，那一刻他想到了什么。他说：“如果是我，我也会扑上去。”

这句朴素的话，我总觉得听过不止一次。在朴素的回忆录里，在那些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里。他们说着不同的事，不同的事里有同一个词：战友。这个词不在纸上，而是在雪山上，在草地里，在每一个扑向同伴的瞬间……这份情谊从未走远。90多年的风，吹过雪山，吹过草地，也吹老了讲述它的人；可这份情谊从先辈口中传到我们口中，还是滚烫的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先辈与我们，也是战友。



昏黄光束，照亮前路泥泞坎坷
温暖灯火，点燃战士心中希望
它是历史天空的一颗星
是艰苦革命岁月的见证

一群向着光明跋涉的行者
手提一盏微光，苦寻民族希望
这般细碎微弱之火
最终汇成燎原之势
燃起不灭的信仰

陈列馆里的马灯
铁壳斑驳，玻璃磨损
往事仍在诉说
马灯仿佛依旧亮着，点亮你和我
和一个大大的家国



第6779期

★ 人在军旅

“红日照遍了东方，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……”第一次听到《在太行山上》时，我还是个刚踏进中学校门的少年。这首歌激情豪迈，有气吞万里的磅礴力量。出生在冀中平原的我，从小没见过山，更不知道太行山在哪里。那时，我常做一个梦，在梦里，我多次飞向太行山，触摸云雾缭绕的山脊，徘徊于纵横交错的千山万壑。

18岁那年，我参军入伍，来到太行山中的绿色军营。白天，我在深山国防工地施工；夜晚，就枕着大山入眠。太行山与我朝夕相处，它不再陌生，不再遥远。我把青春和理想融进太行山，那段岁月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时光。

初见太行，举目望去，那巍峨耸立的山峰，像出鞘的宝剑刺破云端。我心中激动万分——当年，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坚持抗战的坚强堡垒。八百里太行，是消灭日寇的辽阔战场，谱写了抗战的壮丽史诗。在我看来，太行山是革命的山、战斗的山、英雄的山。我庆幸自己参军能来到太行山，虽然我只是普通一兵，但我明白国防施工是为了备战，责任重大。

为此，我曾写过一首小诗：“深山国防工地／四面青山耸立／山头绿荫覆盖／山谷一条清溪／早晨，太阳在山顶梳妆／夜晚，月亮在小溪洗浴／工地上的大喇叭／每天播放豪迈歌曲／军人，也喜欢烂漫的山花／士兵，也爱听林间的鸟啼／我们牢记军人的使命／施工备战挥汗如雨／无暇花前月下／不恋花香鸟语／把青春留给寂寞的大山／太行山是我们的用武之地”。

1966年春天，团长于培德来到我所在的三营检查工作。于团长是山东人，身材魁梧。听说他早年参加八路军，是在抗战烽火中淬炼出来的革命军人。那时，我们三营刚刚从北京进驻太行山，全营官兵在山中搭起帐篷后，随即开始紧张施工。于团长对我们说：“抗战时期，太行山是八路军同日本鬼子生死搏斗的战场；如今，太行山是我们加强战备、建设国防的重要工地。大家要发扬抗战精神，让青春燃烧在太行山上。”听了这些话，我们个个斗志昂扬，施工进度很快。

我被战友们高昂的情绪所感动，写了一首长诗，并在全营文艺联欢会上朗诵。于团长观看了联欢会后，回到团部向机关推荐，将我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工作。

记得那是1967年10月的一天，原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负责新闻报道的同志给我打电话，说《解放军报》特邀我写一篇反映连队政治学习的稿子，需要当天完成。接到任务后，我和宣传股的一位战友骑着自行车，赶到太行山深处的一营四连所在地。四连营房坐落在半山腰，是几孔简陋的窑洞。我们在窑洞里一边吃着晚饭，一边座谈。指导员带头发言，先后有七八个战士谈了学习收获。座谈会结束，我们立即撰稿。等稿件刊发出来，四连的战友们手捧报纸，笑容同山坡上盛开的山花一样烂漫。

记得有一日，于团长对我说：“小乔，我想带你到七连蹲点。咱俩要打起

我们在太行山上

■乔秀清

背包，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，你愿意吗？”

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我愿意，听团长指挥，不给您丢脸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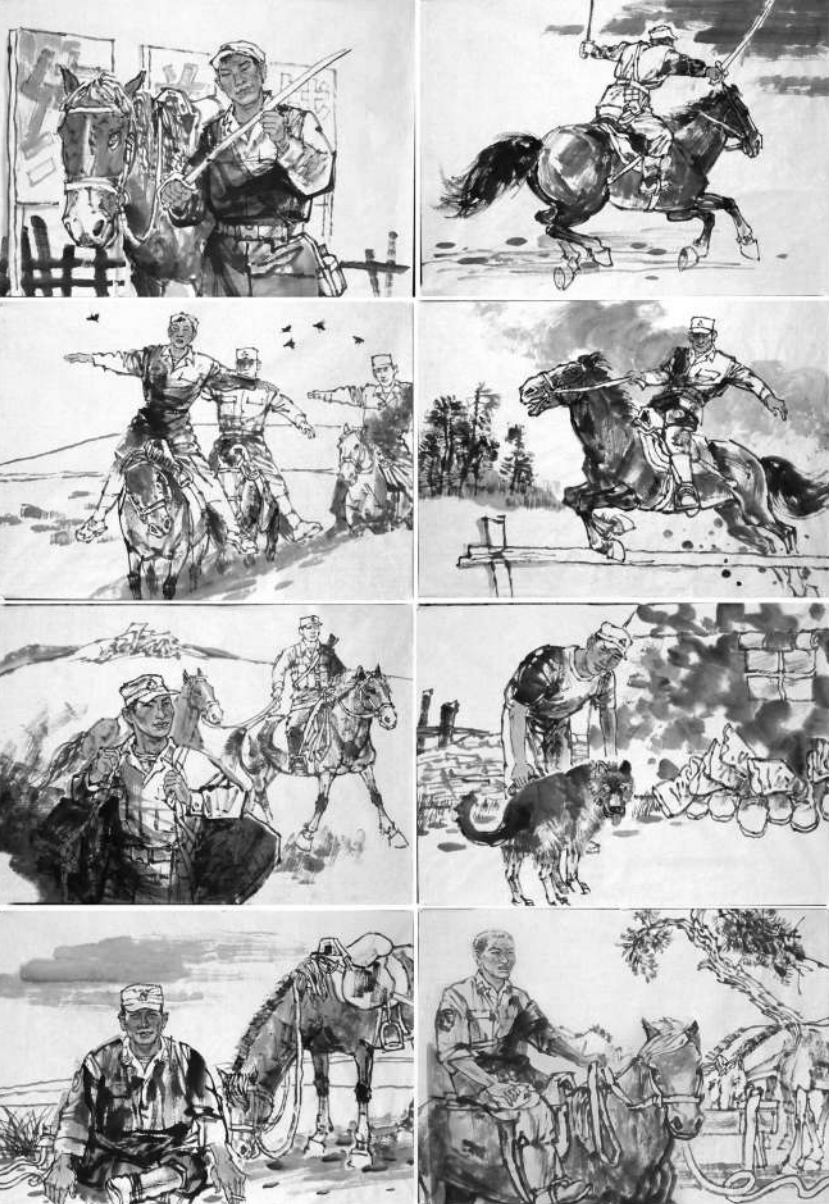
傍晚时分，我随于团长到达太行山凤凰岭下的七连，被安置在一排一班宿舍。连长和指导员想给于团长单独安排在一间宿舍，可他坚决不同意。他说，打日本鬼子那几年，我们总是三四个甚至六七个人挤在老百姓的土炕上，晚上聊着聊着就睡着了，那样的生活很值得回味。最后，于团长被安排在集体宿舍，战士们争着抢他的背包，都想和这位平易近人的老八路挨着睡，听他讲抗战故事。

七连的工地是在山腰开辟出来的一片平地，上面是悬崖峭壁，下面是一条峡谷，地势险要，施工难度大。于团长这次带我来七连蹲点，重点是调查研究施工安全问题。他每天带我到工地上转，风雨无阻。

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天的黎明，我们和战士们一起出早操。铿锵的脚步惊醒了寂寞的大山，也惊醒了沉睡的太阳。队伍在太行山蜿蜒的山道上行进，脚步声整齐有力。跃上山顶的太阳，给群山披上金红，把官兵的红五角星帽徽和红领章映得更加鲜亮。这时，于团长大声说：“同志们，咱们唱首歌吧！歌名是《在太行山上》，预备唱！”

“红日照遍了东方，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……我们在太行山上，山高林又密，兵强马又壮……”激昂的歌声在太行山间回荡，盖住了山谷哗啦啦的流水声，惊飞了林间叽喳喳的小鸟。或许是官兵的激情感染了大山，山中吹来一阵清凉的风，醉人的花香随风飘来。在队伍中，我激动得热泪盈眶：我是太行山的儿子，是太行山的兵！

那时候的歌声，一直在我以后的岁月中间回荡着，越来越响亮，越来越激昂。



骑兵日记(中国画)

杨济淮作